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6.00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涵

马德帅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智慧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成果, 其不仅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 也在生态文明层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论证和科学回答, 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西式现代化道路, 在现实的实践领域实现了二者的逻辑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开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的生态问题的同时, 更是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 为世界上其他国家, 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6-0007-07

引用格式: 马德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涵[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6): 7-13.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 Deshuai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o adapt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It not only constitut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but also reflect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levels. Underpinned by the psychology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gives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us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tegrates the two in the practical field, which fundamentally transcends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Marxism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to modernization by pursuing harmonious

收稿日期: 2022-11-02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吉林省绿色农业发展研究”(2021C40)

作者简介: 马德帅(1989—), 男, 山东莒县人, 吉林大学博士后, 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t shows unprecedente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world: while solving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n its journey to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ina,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for mankind, has proposed a solution to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which provides a practical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vast majo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中被多次论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4],以一条鲜明的逻辑主线贯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始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实际,深刻把握人类社会运行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探索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和全球发展现状,坚持马克思主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理论结晶,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科学指导思想。

一、哲学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智慧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的宝贵成果,其不仅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而且也在生态文明层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特征,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张力。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

马克思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有着大量

且深刻的论述,并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思想。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在批判扬弃传统哲学,以及总结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

具体而言,马克思以实践观革命的方式,超越了传统哲学,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马克思始终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类生存的先在意义。但是,马克思理论语境下的自然界有一个前提,即是人类活动能够涉及、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界。因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5]220},是没有实质意义的“非存在”。其次,马克思通过对“实践”的中介化理解,在现实的历史中完成了自然与精神的统一,解决了恩格斯所言的“哲学基本问题”。传统哲学无论是旧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普遍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缺席的视野下理解主客体的矛盾关系问题,即要么坚持单一的主体性原则,以主体规定客体;要么坚持单一的客体性原则,以客体规定主体。由于二者普遍局限于本原问题而无法自拔,最终造成了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也是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内部难以克服的理论局限。马克思对于传统哲学的“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正是通过引入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以实践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语境下,人的意识能否认识存在,不能只在理论层面抽象演绎,而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因为,“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501}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先天存在、始终如一的,而是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的。最后,在实践的作用下,人类在进行改造自然、推动自然

朝向人的需要方向发展的同时，自然也完成了对人的“改造”，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辩证的有机统一体。正是在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证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时提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解放全人类，也要解放大自然；不仅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也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可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身。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智慧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现成理论，也不是人类现代化实践进程所提供的现成方案，而是习近平总书记马克思主义经典框架下，总结人类文明兴衰所得出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深刻把握住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核心，尤其是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思想，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最终提炼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以及对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先后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理念主张，从根本上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深刻的哲学基础。根据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实践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6]而“科学发展之路”就是要放弃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消耗型发展，向绿色可持续的生态型发展过渡，最终通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既构成了生态文明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一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命题，从根本上明确了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科学关系，在21世纪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机活力，为人类探索一条与自然“和解”的现代化道路提

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哲学智慧。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成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其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深刻指出：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7]正因为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土壤，其所蕴藏的生态文化基因完全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生态文化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关系”始终是历代哲学家所探寻的永恒问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论及人生的“四大境界”时深刻指出，人生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指出的“天人之际，合二而一”的状态。“天”指涉的是自然、宇宙，“人”即为人类自身，“际”乃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乃是浑然统一的整体，正是在人与自然的交合之中，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世界才得以生生不息、持续发展。所以，儒家学者强调，人在天地间，与万物同流，天人无间断^[8]。也即是说，人作为集自然性、功利性、伦理性、超越性于一身的特殊存在物，只能在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到达人生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生存之道。《老子》第二十五章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简而言之，自然法则是万物之最高法则，自然法则不可违背，否则就会招致灾难性惩罚。所以，人类要想更好地生存于世，不能妄而为之，必然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本性，将自然法则转换为人类生存之道，因势利导，最终达致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和谐共生的生存状态。“崇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以来就始终在探寻社会和谐和生态和谐的道路，其不仅向往大同社会，同时也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是说，仁政的实施不仅要做到

爱民,更要将“仁”由人扩展到自然万物,这充分展示了儒家思想中所暗含的生态伦理意蕴。

客观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崇尚和谐”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主张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深度的关联契合;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展现出的生态智慧恰恰与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达成了基本的思想一致。尽管二者相差数千年,并来自不同的文化地域,但其对于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设计,却有着高度的文化共通感。正是缘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气质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而且能够真正做到二者的融合,并且这种融合后的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代中国所用,成为指导现代人类生存发展的科学理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恰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的宝贵成果。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中华民族已传承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大量质朴睿智、发人深思的生态智慧;世界另外三大文明古国之所以灭亡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遭到自然的惩罚与报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态兴衰真正关系到了文明兴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就对《吕氏春秋》中的一句话——“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进行了深刻解读,并提出:“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9]即便在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依然给人启迪,其为我们形成热爱自然、尊崇自然的社会氛围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正是缘于现代中国的发展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思想作为文化基础和理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才能形成、接受、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

二、实践逻辑: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所

呈现出的实践逻辑主要表现为如何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客观来看,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基本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不同观点将直接决定这种生态文明理论在实践层面的科学性、真理性。习近平总书记正是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论证和科学回答,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在实践领域实现了二者的逻辑统一,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呈现出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立场:“深绿”思潮立足于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其典型代表理论是环境伦理学。在“深绿”思潮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促使人类以大规模的技术滥用无限制地开采自然,将自然贬斥为一种“为我而生”的工具性存在,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所以,其普遍强调在价值观层面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通过“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的理论方式弘扬自然价值,将人之伦理作用领域扩展至自然荒野,最终以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变革来根治生态问题。“深绿”思想不仅反人类中心主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反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甚至现代文明,普遍将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进行对立看待。“深绿”思潮的抽象立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最终导致其在现实的实践层面寸步难行。

“浅绿”思潮通过批判基于工业文明的、以“人类专制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为表征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试图建构一种基于生态文明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其典型理论表现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浅绿”思潮看来,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不应该被否定,重点是要通过何种方式合理利用自然进行可持续发展。所以,“浅绿”思潮尤为重视技术进步、市场机制、资本创新等方式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浅绿”思潮的理论主张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但由于其只是看到了生态危机的表层原因,而未能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其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体系下进行“小修小补”。鉴于资本主义天然的反生态本性，“浅绿”思潮也不可能在实践层面真正地解决生态危机。

客观来看，西方生态文明理论要么拘泥于抽象的道德价值层面，以“反人类”的方式将问题的解决方案引入彼岸世界；要么尝试在资本主义原有的框架体系下进行渐进改革，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导致它们在实践层面无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统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既不同于西方“深绿”思潮将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完全对立起来的抽象做法，也区别于西方“浅绿”思潮在资本主义框架体系下不涉及问题根源实质的政治妥协，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体系，从文明形态、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等方面，依照理论到实践的逻辑进路，从根本上厘清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真正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

在文明形态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理解为超越工业文明的全新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0]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态文明时代完全到来之前，正确处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客观来看，为了经济发展而坚持工业文明否定生态文明，为了生态保护而坚持生态文明否定工业文明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表现。我们应始终秉持这样一种历史辩证法：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必经阶段，是人类社会必须完成的历史过程；既不能为了生态文明建设就全然否定工业文明的历史作用，也不能刻意夸大工业文明成果而排斥生态文明的到来。工业文明为生态文明创造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为工业文明确立了科学的发展方向。因而，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兴衰的高度出发指出：“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11]

正是缘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立足于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大视野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所以他反对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通过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坚持与生态文明理念要求相符合的绿色发展方式，二者的矛盾关系完全能够在具体实践中得到彻底解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形象比喻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以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据此来看，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本身并不冲突，并且，二者还能相互促进。因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2]；生产力发展提升的同时，会消耗更少的资源带来更多的产出，不断缩小投入产出比，也会带来一系列与生态文明理念要求相适应的生态化生产技术和生态保护技术。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作为能够解决的矛盾，其核心就是要处理好“要不要发展”和“怎么发展”的问题。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所以，这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深绿”思潮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生态系统稳定与人类生存对立起来的做法，而是明确坚持人类生存的合法性和经济发展的合法性。脱离现实发展来谈生态文明建设的抽象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重点应该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对于后者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西式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化之后，更是要以全方位、多维度、高层次、生态化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丰富跃升的美好生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保护生态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13]。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实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在中国开始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所谓的现

代化“样板”，但后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西式现代化道路并非是四海皆准的。并且，从西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方式的破坏性、反生态性来看，其也不可能具有普适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认识到“西方式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西方式现代化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4]。正是基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批判，中国决定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力求以新发展理念替代传统唯GDP的发展理念、以生态化发展方式替代粗放型发展方式、以科技创新增长替代要素投入增长，最终实现“生产与生态”“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灵活驾驭，有计划地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既没有按照西方生态主义那样，否定增长、敌视发展，也没有按照西方发展主义那样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反对生态保护，而是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取舍和有机协调中，实现了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革，探索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

三、价值指向：“以人民为中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

严格意义来说，任何一种理论的诞生都有着其鲜明的价值目的和阶级立场，即“为谁服务、为谁发展”的价值指向问题。比如，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实的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服务对象是资产阶级，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服务对象就是无产阶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反映到生态文明建设层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的生态问题同时，更是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

提出了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为目标，展现出了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也诱发了大量的生态问题，并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民生、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事业的突出问题。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的生态环境、健康的绿色食品等美好生活需要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已经由求温饱到盼环保，由求生存到求生态了。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深刻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5]现阶段，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生态问题的物质条件趋于成熟，已经到了必须解决、且有能力解决生态问题的窗口期。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明确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环境民生论”既区别于西方“深绿”思潮脱离现实的反人类立场，也区别于西方“浅绿”思潮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资产阶级立场，而是将环境问题上升到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民生政治问题，从现实情况出发对人民群众反映热烈的问题进行无差别的彻底解决。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4]，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对西式现代化反思、批判和超越，展现出了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指向的世界历史意义。对于“世界历史意义”的内涵，黑格尔曾进行过精辟论述。他认为，对于特定民族国家来说，当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发生实质性质变时，就必定要承担相应的“世界历史任务”；相较于“民族历史任务”的局限性

来说，“世界历史任务”具有高度的普遍性特征，因而呈现出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将工业化扩展至世界范围，推动人类文明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发展阶段；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则是要在创造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扬弃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弊端，推动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展现出的“世界历史意义”，根本原因在于其扬弃、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如果这种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种模仿、复制关系，那么就谈不上“世界历史意义”，就不具备“新”的逻辑规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引发的，并且是这种道路无法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一系列现代化问题。

应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具有如下本质要求：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前阶段的中国人口已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即使如此，我们仍坚持通过绿色化、生态化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是资本主义破坏性、对抗性发展方式所无法完成的。如果世界各国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入现代化，地球的生态系统将会难以承受。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受私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决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会制造阶级对立，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全能够通过政府手段在再分配问题上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防止两极分化。反映到世界历史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正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沿线国家带入中国发展的“快车道”，致力于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所以生态问题必然要在发展中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限制他国发展、制造对立的办法将永远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经导致了空前的人类生存的“物化”

状态，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一切活动都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人类社会正面临以人文精神泯灭、价值理想失落为表征的价值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完全是出于工具价值，人与自然是纯粹的工具关系。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扭转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人类精神颓势现状。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会造成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而且也会因盲目逐利带来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态帝国主义实践缓解了国内的生态问题，但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承受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危害。中国式现代化则吸取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并坚决抵制其生态帝国主义做法，积极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充满血腥罪恶的现代化老路已经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并且当前仍然在通过经济入侵和军事霸权的方式巧取豪夺，剥削全球生态资源。而中国坚决反对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试图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以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对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扬弃和超越，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资本与劳动、国家与国家、精神与物质等一系列矛盾问题，正按照社会主义出场的历史任务处于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途中。“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4]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指向，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更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自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实践自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15-11-04(1).

(下转第37页)

- 未来展望[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8, 30(3): 145-156.
- [39] 王庆金, 王 强, 周 键. 社会资本、创业拼凑与新创企业绩效: 双重关系嵌入的调节作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20): 49-57.
- [40] 蔡文著, 汪 达. 资源禀赋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创业拼凑的中介效应[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40(7): 229-238.
- [41] 蒋 兵, 张文礼, 程钧谟. 新创企业创业制度环境、创业拼凑与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决策偏好的调节效应[J]. 软科学, 2021, 35(9): 124-130.
- [42] 姚 柱, 罗瑾璐, 张显春. 勤俭节约: 创业拼凑对创业者节俭式创新的影响[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1, 42(2): 96-111.
- [43] 魏 娟, 赵佳佳, 刘天军. 创业失败、创业拼凑与农民再创业绩效[J]. 软科学, 2020, 34(11): 59-64.
- [44] 孙永波, 杜 双. 创业拼凑与创业机会识别: 二元创新和创业导向的作用[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14): 129-132.
- [45] 张若瑾. 创业补贴、小额创业贷款政策对回流农民工创业意愿激励实效比较研究: 一个双边界询价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2): 88-103.
- [46] 杨建海, 曹 艳, 王 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J]. 改革, 2021(9): 104-120.
- [47] 张立新, 段慧昱, 戚晓妮. 创业环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9(1): 72-83.

责任编辑: 徐海燕



(上接第13页)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 [3]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73.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3-24.
- [7] 顾仲阳.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 人民日报, 2018-05-20(01).
- [8] 程 颢, 程 颐. 二程集: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19.
- [9]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9.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6.
- [11]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9-29(02).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234.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92.
- [14]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18.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

责任编辑: 陈 璐